

美共「美國例外論」的命運及其思考

◎ 賈慶軍

在拙文〈另一種「美國例外論」的產生——莫斯科的權力鬥爭與美共「美國例外論」的產生〉中，筆者已經指出美共的「美國例外論」是受莫斯科的影響才產生的。那麼它的命運如何呢？既然其根源來自外部，那麼其命運必然也受外部因素支配了。當導演出這一場戲劇的布哈林命運轉變時，美共那似是而非的「美國例外論」便風雨飄搖了。

一 莫斯科再起風雲

（一）布哈林的倒台

這一次輪到布哈林與斯大林對陣了。事情的起因是1927年底到1928年初的糧食收購危機。這一次危機將是否繼續堅持新經濟政策問題又尖銳地提了出來。

本來斯大林還對新經濟政策有些容忍，對於農村市場的繁榮導致一批富農的出現這一情況也不太感到憂慮，在1927年12月3日聯共（布）等十五次代表大會上，他還在抨擊左派反對派們要求通過行政手段消滅富農的觀點：「有些同志認為可以並且必須採取行政手段，通過國家政治保衛局去消滅富農，認為下道命令，蓋個印就完事了，這是不對的。這種手段是輕而易舉的，但決不會是有效的。我們應當根據蘇維埃法制採取經濟上的辦法去戰勝富農。……這當然不是說不能採取某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去對付富農。但是行政手段不應當代替經濟措施。」¹十五大決議一致譴責了托、季等人的反對新經濟政策的觀點，並將他們及其追隨者近百人開除出黨。

但大會閉幕沒幾天就出現了糧食收購危機，農民尤其是富農抵制出售糧食。斯大林的立場開始有所轉變，他懷疑新經濟政策是否仍然有效，懷疑布哈林的「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可行性。允許農村保留資本主義確實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使農民逐漸富裕起來了。但富裕起來的農民卻不想支援社會主義建設，這不是同新經濟政策的初衷相違背嗎？社會主義建設能夠看資本主義小農的臉色行事嗎？不能。在還沒有弄清楚到底農民為何抵制糧食收購時，斯大林就本能地立即指示糧食收購人員用「非常措施」，即各種強制手段去收購和沒收富農的糧食，並要求幹部們不要手軟，否則就「把所有不中用的一律撤換，而以忠誠老實的蘇維埃人代替他」。²在此之前斯大林還贊成米高揚的觀點，後者說「必須排除任何強制措施，訴諸強制手段的人是工人、農民的敵人」。但現在斯大林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這還不夠，為了今後免除徵收糧食的麻煩，斯大林決定拋棄蝸牛爬行式的且已經變得礙手礙腳的新經濟政策了。代替它的是以全面的、乾淨俐落的行政手段指導的集體農莊，這正好符合斯大林那專斷、粗暴的性格，他說：「目前蘇維埃制度是建立在兩種不同的基礎上：

聯合的社會主義化的和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個體小農經濟。蘇維埃制度能不能長久地建立在這兩種不同的基礎上呢？不，不能。……必須逐步而又堅定不移地把出產商品最少的個體農民經濟聯合為出產商品最多的集體經濟，聯合為集體農莊。……剷除一切產生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的根源並清除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³對於一個共產主義者來說，做這種設想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在馬克思列寧那裏，共產主義社會就是一個無限完美、和諧的社會，在那裏一切都有條不紊，一切活動都被安排得不差毫釐。沒有矛盾，沒有怨言，一切都是天使、聖人，他們在被指定的位置上永不厭倦地勞動著。整個社會就像一架設計精密的機器，在一道無聲的命令之下正確無誤地高速運轉著。此時的斯大林想要做的就是以不受限制的國家的力量來建造這樣一個社會。無處不在的行政命令將會消滅一切的反抗和報怨，把整個社會組裝成一架社會主義機器，每個人都將被製作成其上的一個零件。只要設計者一聲令下，機器轟然運轉，就會生產出一個健康的社會主義巨人。

布哈林和李可夫竭力反對斯大林的集體農莊計畫。他們認為發生糧食收購危機並不是富農以及新經濟政策的責任，而是由於國家制定的農產品和工業產品之間的不平等的價格體系以及徵糧人員的方法所致。對農產品不利的價格體系以及征糧人員的粗暴態度是農民不願售糧的主要原因。克服危機的辦法應是調整價格體系以及工作人員的態度，而不要以行政強制手段向農民進攻，甚至拋棄新經濟政策。強制措施只會破壞工農聯盟，打擊農民的積極性，不利於整個經濟體系的發展。

鑒於布、李二人的反對，以及農村中許多黨員幹部仍支持新經濟政策，再加上新經濟政策是列寧所批准的，斯大林還不敢貿然拋棄它，於是雙方達成妥協，於1928年4月通過決議，規定要繼續堅持新經濟政策，取消非常措施的使用，但同時要進一步「向富農展開進攻」，推動集體農莊的發展。

然而從整個形勢上看，布、李等人愈來愈處於不利地位。從前面我們對布哈林思想的本質所做的分析以及最近雙方的對抗來看，布哈林與斯大林屬於同一種意識形態，他們都同意最終與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無產階級專政相匹配的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所不同只是通達這一目標的過程、所用的手段和時間。本來兩人都同意用新經濟政策這一經濟手段來逐漸消滅個體經濟，最終使農村與城市一起融入由國家統一管理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但是糧食危機使二人出現了分歧，他們所制定的解決農村經濟問題的內容大體一致，但其操作順序卻截然相反。斯大林認為，在農村，「（一）首先，出路在於從落後的分散的小農戶轉為有機器供應的，用科學成就武裝起來的，能生產最大量商品糧食的聯合的公共的大農莊。出路在於農業方面由個體農民經濟過渡到集體的公共經濟。……（二）其次，出路在於擴大和鞏固原有的國營農場。……（三）最後，出路在於不斷提高中小個體農民經濟的單位面積產量。」布哈林則認為：（1）工農聯盟由於強制手段的使用正處於破裂的前夕；（2）目前必須恢復商業和市場貿易的自由，緩和國家的控制和對資本主義因素的進攻；（3）不要過高估計建設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意義，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包括富農經濟在內的個體農業上。⁴

分歧一出現，斯大林就悄悄地施展宗派手段來對付不同意見了。在1928年4月，他就指出黨內存在「想在農村中實行一種既使富人喜歡也使窮人喜歡的政策」的「傻瓜」，這自然是指布哈林等人。6月他又粗魯地斥責布哈林的支持者、代理財政人民委員弗魯姆金致政治局的信是「知識份子式的哀鳴」，是「失掉理智，張惶失措。……『疑心生暗鬼』」。他還明確指出這封信「集中體現了右派的政治路線」⁵。這是斯大林首次對布哈林等人上綱上線。

面對斯大林的步步進攻，布哈林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況且托、季等人的教訓就在眼

前，布哈林不得不想辦法阻止斯大林的瘋狂行為。1928年7月，他與加米涅夫進行了會談，其間布哈林說道，「斯大林是無原則的陰謀家，為了保存自己的權力，把持著一切，他的主張是根據排斥異己的需要而變化不定的」⁶。布哈林此舉是徒勞的，也是不明智的，因為加米涅夫等已被打成反對派並被開除，他們實際上已不具有甚麼號召力了，同他們纏在一起只會為斯大林提供打擊異端的理由。不過布哈林的話有利於我們理解斯大林的行為方式，即他的言行並不只是根據客觀要求而做出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為了爭奪權力而做，而且他常常是為反對他人而反對他人，不管其說的、做的對錯與否。不久他又獲得一次打擊布哈林的機會。

1928年9月又出現了糧食徵購危機，這次危機又是靠強制措施來解決的。當愈來愈多的中央委員相信只有靠強制措施來解決糧食問題時，他們自然會產生這樣的觀念：新經濟政策已然失效了，唯有以制度化的強制手段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才能徹底解決農村問題。不能再對農民心慈面軟了，也不能容忍右傾分子再為農民說情了。他們開始埋怨中央「只講對托洛茨基的鬥爭，對右派則保持沉默」⁷。在這樣的氣候下，斯大林決定向布哈林宣戰了。1928年10月19日，斯大林在聯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作了《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的報告。不過他只指出在中央委員中有右傾分子，而政治局內則沒有。聯席會議最後只解除了幾名布哈林的追隨者的職務。斯大林要待時機成熟後再動布哈林。

1928年11月，中央委員會全會上通過了《關於1928—1929年度的國民經濟控制數字》的決議。在這一決議中斯大林的觀點佔了上風。決議認為造成農業落後的根本原因是組織上的，而非如布哈林所說是經濟上的和工作態度上的，所以解決農村問題的途徑就是實行大規模的集體化，提高產量和建設新的國營農場。為了對付日益增加的國外軍事威脅，當務之急是在經濟技術上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以無論是國外威脅還是國內經濟困難都要求必須進一步推進工業化。決議還指出，在當前經濟緊張、階級鬥爭尖銳化的條件下，黨內出現了右傾，托洛茨基主義也有死灰復燃的跡象，但右傾是目前的主要危險。這次全會表明蘇共整體的意識形態神經愈來愈敏感了，「左」的情緒在全黨上下開始瀰漫，斯大林則要充分利用這種氣氛來達到他的各種目的。

糧食危機為斯大林再次將全黨引向「左」的路線提供了理由。究其原因，糧食收購危機大部分是強制措施引起的，而斯大林卻認為是強制措施不夠嚴厲造成的，如此便成了惡性循環：強制手段越頻繁，農民反抗也越頻繁，而反抗又促生了更多的強制，最終的結果將是一方消滅另一方，蘇共此時對農民的態度就像兩個人打架，一方打了另一方，卻又以另一方的反抗為理由要消滅對方。在蘇聯共產黨的字典裏沒有讓步一詞，它作為真理的化身永遠正確，任何反對的舉動都會被它視為對真理的污辱而被壓制或消滅。任何的反對和異議都只是不斷刺激它的征服和進攻的欲望而不是使它自我反省。常掛在它嘴邊的自我批評是它自認為完美的驕傲顯示而不是甚麼謙遜的標誌，因為這樣一來它更容不得任何外來的批評。因此它從不會平等地看待他人，他人總是它征服或統治的物件。對農民是這樣，對一切人都是如此。僅埋怨斯大林把全國搞得烏煙瘴氣是片面的，可以說每個同他有著同樣意識形態、同樣思維模式的人都是他的同路人，不論是正統派也好，還是反對派也好。

作為一個優秀的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ABC》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作者，布哈林更支持計劃經濟和集體農莊，只不過他認為不能求快，而是求穩。他對農民並無特殊的好感，他更關心的是他的平衡理論，而農民是他的平衡理論中的一顆棋子，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塊墊腳石。無論在斯大林還是在布哈林眼中，人並不成其為人，而只是一件工具，他們的分歧只是在於如何來使用這件工具。只要我們分析一下布哈林在闡述富農政策時所用的措辭，我們

便不難理解為何布哈林最終會同斯大林講和了。他說：「富農的合作社巢穴，也會同樣經過銀行等等長到這個體系上面；但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異類，例如，像租讓企業那樣。那些富農領導的合作社以後將變成甚麼樣呢？……這個富農合作社如果要能夠發展壯大，同樣必需像其他一切合作社那樣，與國家的經濟機構聯合在一起，比如說，它會把自己的閒置的現金存入我們的銀行，以便取得一定數量的利息，即便這類的合作社成立自己的銀行組織，它們也非得和無產階級國家的強大的信用機構聯結在一起不可，因為後者掌握著國家的主要信貸資金。富農和他們的組織反正無路可走，因為在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以及這一專政的經濟組織的已經相當強大的力量早已規定了總的發展範圍。如果富農（不管願不願意）必須把款子存入我們的銀行，如果他（不管他是否願意）通過各種關係同我們的經濟機構聯繫起來，那麼他不可避免地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著重號為筆者所加）⁸既然這位最「右」、最開明的革命家都預設了富農們的「異類」「巢穴」的「無路可走」，而且「不管他是否願意」，那麼還有甚麼理由反對斯大林消滅因不公平待遇而反抗征糧隊的富農呢？還有甚麼理由不支持集體農莊這一「專政的經濟組織」呢？

事情的發展愈來愈有利於斯大林。糧食收購危機之後，布哈林與加米涅夫秘談一事又被揭露，斯大林正式向布哈林發起了進攻。1929年1月30日，在政治局、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上，斯大林作了題為《布哈林集團和我們黨內的右傾》的報告，要將布氏徹底打翻。布哈林奮起反擊，他指責中央委員會對農民實行的是軍事封建剝削，工業化政策是殺雞取卵，又攻擊黨內缺乏民主，共產國際官僚化嚴重。然而一切都晚了。布哈林等人的反抗只是促使中央委員會更快地清除了他們。

4月，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召開全會，斯大林作了《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的報告，他以其特有的粗暴方式咒罵布哈林等人，稱布氏「充當了人民敵人的尾巴，」「不久以前還是托洛茨基的門徒」，布哈林的理論是荒謬的「胡說八道」，布哈林派的宣言是「無恥的粗暴的造謠」等等。當布哈林想用個人友誼來使斯大林緩和其態度時，斯大林不屑地說，這些「牢騷和喊叫連一個破錢都不值得」⁹。這就是斯大林對待以前的朋友和同志的態度。在意識形態和利益面前，其他一切一律免談。布哈林被全會撤銷了職務。常常專政他人的布哈林，在被專政時發出的要求民主的脆弱的聲音，招來的只能是對其自私和虛偽的譴責。

1929年4月23日召開了聯共（布）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斯大林的路線取得了全面勝利，性急的革命者們都支持高速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全面貫徹布爾什維克的原則。一座全國性的強制勞動營即將出現。

1929年7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將布哈林開除出執委會主席團。11月，蘇共中央委員會撤銷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員頭銜。

11月26日，布哈林等在《真理報》上發表了自我批評的聲明，其中寫道：「我們有義務聲明：在過去的一年半中，在一系列政治和策略問題上發生分歧，而在這個論爭中正確的是黨和中央委員會。」¹⁰這是不奇怪的，布哈林再怎麼造反也不會反出他的意識形態，不會反對他的黨及黨的專政。況且集體農莊政策一出，糧食危機立刻就解決了，因為反抗的力量都被強大的國家力量壓制下去了，沒有人認為這有甚麼不對的。托洛茨基的追隨者也紛紛拜倒在斯大林的腳下，因為他給予他們的比他們所需要的還要多，他們要求「左」，而此時的斯大林比托洛茨基還要「左」，手腕更鐵、更殘酷。¹¹連麥德維傑夫都支持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還有甚麼辦法呢？既然都在同一種意識形態下，既然人們都喜歡命令和奴役，誰又能

擋得住呢？人人都呼喚鐵的手腕和極權統治，斯大林又等甚麼呢？至於那必然的鐮刀會臨在一些人的頭上，那也不過是他們為必然的事業所作出的奉獻而已。他們應該含笑接受這一命運的眷顧。

蘇共內的地震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共產國際路線的變化，而共產國際又會將這種震動傳到世界各地，美共能夠逃脫嗎？

（二）共產國際的轉變

隨著布哈林的每況愈下，由布哈林主持的共產國際愈來愈聽命於斯大林。共產國際的路線也開始向左轉。

早在1928年1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評價聯共（布）十五大時就講到，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不僅僅是對蘇聯來說，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如此，「資本主義世界最初幾年的『穩定過程』也結束了」，¹²新一輪的革命高潮就要來臨。這是對布哈林關於資本主義處於相對穩定階段的觀點的修正。執委會還將托派同法西斯和社會民主黨左派聯繫起來，將他們視為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主要威脅。這是對布哈林關於要聯合社會民主黨左翼的觀點的修正。

1928年2月，共產國際召開第九次全體會議，更明確地提出了社會民主黨左翼是最危險的敵人的觀點，「他們以同情和『有條件地』支持的謊言隱藏他們針對蘇聯的鬥爭，……這些所謂的左派機會主義領袖是共產主義、共產國際以及蘇聯的最危險的敵人」。會上還提出要英國共產黨利用向左發展的群眾運動去反對勞工黨，並以革命工人政府的口號取代勞工政府的口號。這就要求各黨工會政策迅速向左轉，以共產主義革命工會取代改革主義工會。¹³聯共（布）十五大上的左的觀點已全被共產國際接受了。而「左」的趨勢仍在發展。

隨著布哈林與斯大林爭吵的加劇，共產國際的路線愈來愈偏向「左」，布哈林的觀點在一點一點地被蠶食掉，到了1928年7—9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六大上，布哈林被迫提出了「第三時期」理論並承認右傾是主要危險。

布哈林對斯大林最為明顯的讓步是對資本主義相對穩定這一論斷的修正。他明確提出，「這種相對穩定，相對穩定的估計在很多方面已經不符合今天的形勢了」。他推翻了他以前的論斷，「過去曾認為，我們只在這一或那一國家看到生產的某種增長，並且這還幾乎是個例外。這種增長並不特別典型，它僅僅被看做是偶然的『特定的』的狀況。明天或者後天將會出現另一種過程。如果今天我們在某個國家裏看到技術的發展，生產力的增長，良好的市場情況，那只不過是『經濟蟬蟻』，是不能當真的。」這等於說他的關於「美國仍處在上升階段」的論斷是胡說，「不能當真的」。布氏輕巧的一句話就抽掉了「美國例外論」的基石。由於他是被迫出爾反爾的，他仍在暗中與斯大林相對抗，以致他的言論中矛盾重重。他在逐個地分析資本主義國家時得出的是他的觀點，即資本主義仍在發展，但在總結其普遍特徵時又向斯大林妥協，莫名其妙地得出相反的結論：「資本主義的普遍危機在繼續著，甚至在發展……這種變化必然使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一切矛盾成十倍地尖銳化並最終導致它的滅

亡。」¹⁴還有，他既主張加緊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但又不放棄統一戰線策略；他既認為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是正確的，又承認官僚主義弊病嚴重，黨內生活和共產國際支部活動不正常，幹部隊伍素質低下，工作和鬥爭方法粗魯、卑劣；他承認共產國際的主要危險是右傾，但這個右傾卻是無所不包，從「極左」派到右派全被辯證法統一起來。¹⁵

這種混亂是他同斯大林鬥爭的結果，但是從這個大雜燴中我們不難看出，其整體趨勢是向左傾斜的。事實證明，在六大之後，布哈林在共產國際的影響是一落千丈，斯大林開始控制共產國際，並在共產國際內展開了清掃右傾的運動，積極支持布哈林的美共書記洛夫斯頓不幸撞在了槍口上。

二 美共的反應以及「例外論」的命運

（一）六大前的較量

當共產國際於1928年初向左轉時，洛夫斯頓等已有所察覺，但並未太在意。駐共產國際的美共的老朋友佩珀也建議他們不要放在心上。佩珀對共產國際的新路線不以為然，他認為共產國際根據歐洲的狀況制定的政策不能被機械地用於美國。因為美國與歐洲有著根本不同，如：美國的資本主義仍處於上升階段；美國帝國主義的力量仍在增長；美國工人階級比歐洲要優越得多；美國工人階級沒有自己的群眾性政黨；左傾路線在全國範圍內沒有市場等。所以適合美國條件的仍然是一個群眾性的勞工黨，就像英國的勞工黨一樣。¹⁶佩珀的「美國例外論」看起來比洛夫斯頓的還要「例外」。所以，他在莫斯科受到的猛烈攻擊可想而知，只有布哈林對他表示了寬容。

在蘇共的矛盾公開之前，洛夫斯頓並不感到依靠佩珀和布哈林會給他帶來甚麼麻煩，他認為跟隨他們也就是跟隨著國際。在他於1928年2月寫的《1928：總統競選和工人》這一小冊子中，他仍在提倡要建立一個農工黨，而不是革命工人黨，因為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並未激進起來。¹⁷

與洛夫斯頓相對的是福斯特集團的觀點，福斯特對共產國際向左轉持贊同態度，他正好可以借此來打擊洛夫斯頓的悲觀論調，可以批判他「低估群眾的左的動向」，「缺乏鬥爭的眼光」。¹⁸為福斯特集團打氣的是紅色工會國際主席、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A·洛佐夫斯基。他是斯大林的支持者。洛佐夫斯基對洛夫斯頓在美國工會政策上的態度很不滿意，在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會上他就指責美共的「坐等的態度」，批評其「拯救工會」的口號是「無用的口號」，乞求工會官僚去組織未被組織的工人是錯誤的。他要求美共立即離開路易斯的美國聯合礦業工人工會，另建新的礦工工會。洛夫斯頓明確拒絕了洛佐夫斯基的要求；畢特曼同意建立新礦工工會，但拒絕拋棄「拯救工會」口號；福斯特則建議同莫斯科繼續談判。最後的結果是，美共不同意離開礦工工會和勞聯另建新工會，但同意在礦工基層中建立共產黨人控制的支部。¹⁹

洛佐夫斯基仍不滿意，在第九次全會後不久召開的紅色工會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他向以比爾·鄧恩、本傑明·吉特洛和傑克·約翰斯頓為首的美國代表團發動了強大的攻勢。經過十天的軟硬兼施，美國代表團終於同意以三種方式來組織未被組織的工人，即通過加入「反動工會，通過在舊工會中建立新的支部和建立全新的工會的形式」來組織工人。²⁰

然而美共仍然對洛佐夫斯基的政策陰奉陽違，連福斯特都加入洛夫斯頓的行列來對抗紅色工會國際。因為福斯特一直是反「雙重工會主義」的主要代表。而且此時莫斯科的鬥爭還不明瞭了，布哈林和佩珀對洛夫斯頓的支持力量仍不可小視。福斯特便不敢貿然跟隨洛佐夫斯基。這一切使洛佐夫斯基大為惱火，他不得不動用莫斯科的權威來壓制美共。在六大前美共接連

收到共產國際的兩道命令，一是命令他們建立一個新的紡織工會，一是命令建立一個新的礦工工會。這就使得美共無法推諉了。

雖然洛夫斯頓等人有些順從了，但洛佐夫斯基不會忘記他們的怠慢之處，他要讓他們在六大上付出代價。

（二）六大上的妥協

如前所述，在共產國際六大上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們迫使布哈林全面向「左」轉，不過在他那份被斯大林等人修改得面目全非的報告裏，布哈林還是在儘量保持自己的聲音。再加上雙方勝負仍然未分，在表面上他們仍維持著一種團結的假像，如在六大期間當有些代表提到的蘇共政治局中的分裂問題時，他們還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聲稱：政治局內部沒有意見分歧，並對散佈政治局內部有對立的謠言提出抗議。²¹因此在六大上當洛夫斯頓等受到洛佐夫斯基以及美共中反對派的攻擊時，布哈林為他們做的辯護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使得雙方達成了妥協，洛夫斯頓安然過了這一關，下面簡要闡述一下雙方在具體問題上的分歧，以及這些分歧可能帶來的後果。

借六大提出反右傾危險之機，美共內的反對派向共產國際的英美秘書處提交了一份題為《美國黨中的「右傾危險」》的報告，除白勞德外，反對派的主要人物約翰斯頓、鄧恩、坎農、福斯特、畢特曼等都在上面簽了名。此報告的主要內容就是控告洛夫斯頓過高估計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力量而低估了美國激進化的發展，因而形成了美共內的「右傾危險」。洛夫斯頓不知有多悲哀，點燃轟擊他的「美國例外論」的炮火的竟是他的戰友。反對派認為，「美國資本主義就要達到它生長的頂點了」，在工廠中則出現了普遍的激進情緒。²²所以美國「極有可能」爆發一場「帶有革命特點」的鬥爭，儘管美國不是歐洲。但美共應採取「階級對抗階級」的策略。²³

洛夫斯頓當然不願意被說成是右傾，他同佩珀一起批判反對派的「成長頂點論」和工人階級已經激進化的觀點。他們認為，承認美國資本主義仍在發展的事實，不等於過高估計其實力；他們也承認工人階級會出現普遍激進化的情況，但不是現在。現在改良工會領袖和資產階級政客仍能欺騙大多數工人；勞聯在今後也仍有發展的可能性，而不是會瓦解。不過，洛夫斯頓也做了一些讓步，聲稱美共已開始著手創立新的工會，他也不再認為共產國際針對歐洲黨的策略並不適用於美國。²⁴他還承認美共在對待社會黨問題上有些「右傾」，在工會工作和黑人工作中不夠積極。但從總體上看，美共並不比其他黨犯有更嚴重的錯誤。²⁵

不過反對派並不是要聽洛夫斯頓的分析和辯解，他們只想推翻他的領導，為此他們使用了各種手段，連共產國際的洛佐夫斯基、羅明那茲和英美書記處的皮特羅夫斯基都加入了反對洛夫斯頓、佩珀的行列。洛佐夫斯基批評洛夫斯頓派「甚麼也看不見，只看到美國資本主義的力量」。羅明那茲則對佩珀的個人品質及其既往歷史進行了抨擊，嘲諷他會在「一天或一小時之內」改變立場。洛夫斯頓則極力為佩珀辯護，他諷刺洛佐夫斯基，說「他總是將他所碰到的任何事情弄糟」。不僅如此，激動的洛夫斯頓還批評了斯大林領導的蘇共代表對布哈林的不尊重。²⁶洛夫斯頓如此公開對抗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並維護布哈林，使他在以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不僅如此，反對派還展開了外交攻勢，他們想讓大會給美國黨發一封公開信，督促其改變政

策，也就是要改換領導人。但大會拒絕了他們。此後福斯特獲取了一個同斯大林私下會晤的機會，這使反對派喜出望外。福斯特決定利用這一機會來扳倒洛夫斯頓，他將與斯大林的談話寫成了一封信寄回國內，以使自己一方的力量有所增強。信的內容大致是：斯大林反對一擊之下就清除洛夫斯頓集團，而且這也不能由共產國際來做。福斯特說他們並無此意，他們只是想讓共產國際發公開信給美國黨，要其批判中央委員會以及洛夫斯頓集團的「右傾」路線，並規定在總統選舉過後兩個月召開黨的大會，福斯特還告訴斯大林說布哈林沒有批判美國黨內的「右翼」危險。福斯特的結論是：斯大林堅決支持他們而反對洛夫斯頓集團，光明是屬於他們的。²⁷

這封信給我們傳達出了很多信息。首先讓我們理解了斯大林打擊對手的手法，斯大林不會在一兩次的批判之下致對手於死地，而是放手讓對方犯更多的錯誤，這就使斯大林最終徹底清除對手時不僅使局外者心服口服，就是對手也無話可說，甘心認輸。其次，斯大林從不會讓自己陷在宗派泥潭之中，他不會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同任何個人或宗派結成親密聯盟，他始終保持自己能夠脫身的自由，這使他既可以支持任何一方，也可以打擊任何一方。所以他最反對支持他的人自稱為斯大林派，他不能是一個宗派，他要代表的是中央，是真理。只有這樣他才能始終立於不敗之地。從前面的權力鬥爭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一點。所以他不會對福斯特許諾甚麼，更不會讓福斯特把他拖下水。因此當福斯特打著「斯大林派」的招牌去招搖時，他得到的是斯大林的一通痛斥和責罵。不過，從信中我們仍能看出，福斯特已判斷出了蘇共內的鬥爭趨勢，即布哈林已輸給了斯大林，所以他才毫不顧忌地攻擊布哈林，討好斯大林。

不幸的是，福斯特這封信被留在美國的洛夫斯頓的戰友吉特洛截獲了。吉特洛立即將此信以電報形式傳給了莫斯科的洛夫斯頓，洛夫斯頓試圖讓斯大林批評這封信，但沒有成功。於是洛夫斯頓等公開了這封信的部分內容。也許正是這封信暫時阻止了洛夫斯頓派在六大上的失敗，但同時也加深了斯大林要清除這一不服管教的集團的決心。

如前所述，洛夫斯頓集團未在六大上被打成右傾還由於斯大林未等到適當的機會徹底打垮布哈林，布哈林在共產國際仍有著一定的影響力，當時許多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代表仍支持布哈林，並對「走廊會議」²⁸感到驚訝和不滿。因此布哈林對其支持者的保護還有一定效力。在大會上，布哈林支持洛夫斯頓的觀點。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不可能在一日之內就從世界經濟中消失」。他還坦率承認他對美國近期出現直接革命形勢並不抱期望。他批評反對派將認為美國經濟仍在發展的同志等同於對美帝實力的「大肆鼓吹」者，反對派「企圖利用那種重大轉折關頭的最尖銳形式」把黨內鬥爭擴大化是不對的。²⁹共產國際關於美共問題的最終結論是：「指控黨中央委員會多數派代表『右傾』路線是沒有根據的。」³⁰

綜合各種因素，洛夫斯頓派在六大上暫時保住了領導地位，反對派則討了個沒趣。但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洛夫斯頓被這一表面的勝利所麻痹了，這使他對布哈林的江河日下之境況有所失察。待他發現事情不妙時，他已回天乏力了。

（三）洛夫斯頓的失察

伴隨著布哈林那讓人難以察覺的權力的跌落，美國卻迎來了又一個經濟小高潮。到了1928年末，美國經濟不僅未象美共反對派和共產國際所預測的那樣發生普遍的危機，而是又一次技術革命帶來的發展。這更堅定了洛夫斯頓、佩珀等人先前的立場，他們聲稱：「美國正在發

生一次強有力的技術革命，巨大的合理化，生產力的發展，使其影響堪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相比。」但反對派代表福斯特、畢特曼則認為這次經濟回升並未使「普遍的蕭條有了明顯的起色」，充其量也只是阻止蕭條轉變為經濟危機。雙方分歧仍在：洛夫斯頓強調美國資本主義的力量，畢特曼則強調其衰落；洛氏將不可避免的危機推到了遙遠的未來，而畢特曼則認為它就在眼前。³¹

洛夫斯頓仍敢堅持這種立場是同他在共產國際六大上的小勝，以及他在美國共產黨12月全會上的壓倒性勝利分不開的。這使他認為無需修正他的立場，他也仍在為布哈林辯護。當斯大林一次次地在蘇共會議上講「右傾」危險，矛頭漸指布哈林時，洛夫斯頓在美共全會上卻說：「對我來說，布哈林同志代表共產主義路線，代表蘇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路線。因此布哈林同志是共產國際的權威……對我來說，他並不代表共產國際的『右翼』，儘管有時候他是。」³²

此外，洛夫斯頓又在佩珀問題上衝撞了莫斯科。共產國際在六大結束後立即下令召佩珀回莫斯科。佩珀自大會後跟隨美國代表團回國，此後百般拖延，賴在美國不走。他的行為受到了洛夫斯頓的支持，兩人還發表了類似同患難、共生死的聲明。³³這一切都加強了斯大林要收拾這個集團的決心。

在1928年11月，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就送來了暗號，表示它並未說要支持多數派，洛夫斯頓漸覺不妙，便派沃爾夫到莫斯科去看個究竟。沃爾夫到了那裏才知，莫斯科已變了天，布哈林已被架空了。他還得知共產國際還準備給美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發一封公開信，聲稱它已不再支持多數派。沃爾夫拖著病體請求共產國際不要發這封信，但已無人理睬他。最後是布哈林到病床前來看望他，布哈林無奈地告訴他，「由五票對四票決定，我病得太重，不能在共產國際主席職位上工作了」。³⁴

（四）大廈將傾

1929年1月，共產國際先發了一封信來試探美國的忠心，建議各級領導人自由發表他們對共產國際路線的意見，最後決定是否支持共產國際的路線。不難猜測，到處是一片獻忠心的呼聲。福斯特放棄了多年來堅持的雙重工會主義立場，同以前的戰友畢特曼等盡釋前嫌，一齊拜倒在共產國際的腳下。洛夫斯頓此時也不敢怠慢了，為了彌補以往的過失，他的忠誠表現絲毫不遜於反對派。

忠心照收，但該清除的還是要清除。共產國際撤換洛夫斯頓的命令不久就降臨了美共。這一命令是以兩個建議的形式傳達的：一個是公開的政治上的建議，一個是秘密的組織上的建議。這兩個建議是由共產國際派來參加美共六大的兩個代表，德共黨員菲力浦·登格耳和英共黨員哈裏·波立特帶來的。

政治建議的主要內容是要雙方停止宗派鬥爭。共產國際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批評雙方是在搞無原則的宗派鬥爭。但共產國際著重指出要注意美共記憶體在的右傾危險，「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性質，危機加劇的前景，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穩定性的進一步破壞，反對右傾危險的鬥爭問題——這一點最近已經成為共產國際所關心的主要決定性問題」³⁵。這一批判明顯是指向洛夫斯頓的。因此我們不難猜測到共產國際在組織上的建議內容：在即將召開的美共六大上選福斯特為總書記，鬥爭雙方的兩個代表洛夫斯頓和畢特曼則要辭去在美共中的職

務，到莫斯科去聽候處理。

在宣讀這些建議時，共產國際的代表登格耳明確表示他對反對派的支持，洛夫斯頓會有何反應呢？

（五）洛夫斯頓的反抗

從以往洛夫斯頓衝撞斯大林的記錄來看，這個年輕氣盛的知識份子是不乏勇氣的；從知識和真理的角度來看，共產國際的懲罰是沒有理由的，因為洛夫斯頓的觀點是較符合美國現實情況的；而從群眾基礎上來看，共產國際更沒有理由撤換他了，因為在剛當選的美共六大代表中，超過九成的代表支持他。³⁶共產國際不是崇尚多數原則嗎？

於是洛夫斯頓及其支持者們組織起了美共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對抗莫斯科的行動。他們要控制即將召開的美共六大，迫使莫斯科收回成命。

1929年3月1日，美國工人（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召開。在政治委員會上，共產國際代表要求美共立即接受共產國際的決議，選福斯特為總書記。洛夫斯頓集團中的貝達特、邁納、斯塔奇爾、韋恩斯頓等人齊聲反對這一建議。兩大集團立時混戰起來。洛夫斯頓集團指責福斯特不夠資格做總書記，並逐一批判福斯特的所作所為；福斯特集團則抨擊洛夫斯頓集團是布哈林的尾巴。

此時的洛夫斯頓所採取的策略是，儘量做得讓莫斯科滿意，從而使之收回撤換他的命令。通過反對派的攻擊以及共產國際代表的提醒，洛夫斯頓集團了解到：莫斯科對他們的布哈林傾向十分不滿，要讓莫斯科歡心，就必須要點名批評布哈林，於是洛夫斯頓集團採取了一個令反對派也感驚奇的行動，他們在大會上提出建議，要將布哈林正式從共產國際領導崗位上驅逐出去。他們還建議發電報給蘇聯共產黨，慶祝在斯大林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黨取得的勝利。洛夫斯頓集團討好斯大林的步伐此時已超過了福斯特集團，他們對布哈林的態度甚至比斯大林還激進。在這一系列的諂媚之後，洛夫斯頓才決定向斯大林提出自己的要求，他安排一個「無產階級」代表團聯名致電斯大林，請求他修改共產國際的組織建議並允許美共大會在共產國際的贊同下自己選擇領導人。³⁷這一請求成行的話，洛夫斯頓自然就高枕無憂了。

斯大林的答覆是，大會可以自己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但其他決定照舊，即除了福斯特可能做不成總書記外，洛夫斯頓依然要被遣往莫斯科聽候處理。大會決定先按斯大林的建議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之後再商議洛夫斯頓的去處。結果洛夫斯頓派大獲全勝，十四個政治委員中他們佔了十人。大會還選舉了一個三人書記處來取代總書記一職。三個書記分別是：執行部書記吉特洛，鼓動宣傳部書記貝達特，工會書記福斯特。

為了幫助洛夫斯頓，其支持者們頗費了一番腦筋。仍在莫斯科的沃爾夫建議派一個美國代表團到莫斯科去，就所有問題同蘇聯領導人面對面地進行協商。這一建議被多數人接受，只有佩珀警告他們說，他們這一去恐怕會「落入斯大林的手掌心」³⁸。但掌握了中央委員會的洛夫斯頓集團自信自己有能力說服莫斯科。他們大概認為莫斯科應該是一個講道理的地方，不過不久他們就會明白斯大林的道理是甚麼樣的了。正當斯大林發愁對他們鞭長莫及之時，他們自己卻送上門來了。

到莫斯科去的除了洛夫斯頓、吉特洛、貝達特率領的十人「無產階級代表團」外，還有莫斯

科另行召去的福斯特、畢特曼、韋恩斯頓等反對派代表。十人代表團路過柏林時，剛被共產國際在反布哈林運動中開除的印共黨員M.N.羅易再次警告他們不要去自投羅網，但過於自信的美國同志們又拒絕了這一勸告。看來人真是不撞南牆不回頭的。

（六）斯大林的邏輯

美國代表團於1929年4月7日到達莫斯科。一周之後共產國際的美國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討論美共的問題。同時蘇共4月全會也在進行之中，這次全會徹底打垮了布哈林集團。在莫斯科的各國共產黨領導人共一百多人列席了美國委員會的聽證會。

美國委員會先讓美國代表團陳述他們的問題和觀點。於是兩大集團又開始了無休止的攻擊和指責。委員會則對他們所陳述的問題追根溯源，明確責任。這樣的議程斷斷續續進行了將近一個月。在會議上雙方都醜態百出，極盡挖苦、嘲諷、誣蔑之能事。每一方都想將自己洗淨而把他人抹黑，結果是大家都被搞得一團黑。那麼坐收漁利的是誰呢？自然是審判官了。當雙方都揭盡各自短處的時候，正義純潔的審判官便可以從容地收拾他們了。雙方懷疑甚麼都可以，但絕對不能懷疑共產國際的審判官地位，這也是他們無法跳出莫斯科的掌心的根源所在。

當雙方撕打得精疲力盡時，共產國際便開始發話了。5月6日，斯大林的講話便代表了美國委員會的最終裁決。從斯大林的邏輯中我們便能了解：共產國際所宣導的布爾什維克化是甚麼？列寧主義原則又是甚麼？是要「一般」還是要「例外」？對抗共產國際會有甚麼後果？

要想徹底摧毀對方的反抗，首先就要指出他的錯誤，並將它誇張到致命的程度，使之在神聖的事業和理想面前羞愧難當，自甘認罪。斯大林無疑諳熟這套治人的技藝。他首先總結了兩個集團所犯的錯誤，「在討論過程中已經很清楚了，兩個集團都犯有根本性的錯誤，他們都誇大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具體特徵。……這種誇大是基於多數派和少數派所犯的每一個機會主義錯誤根源之上的。忽視美國資本主義具體特徵是錯的。共產黨在它的工作中應將它們考慮進去。但是將共產黨的活動建立在這些具體特徵基礎上將更加錯誤，因為每一個共產黨，包括美國共產黨在內，必須將其活動建於其上的基礎必須是資本主義的普遍特徵，而不是任何給定國家的具體特徵。這一普遍特徵在所有的國家都一樣。共產黨的國際主義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具體特徵僅僅是普遍特徵的補充而已。兩個集團的錯誤就是他們誇大了美國資本主義具體特徵的意義而低估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徵，也就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特徵。」³⁹

斯大林這一套具體與普遍的辯證法立即封殺了美國同志們的所有退路。在這套辯證法下，即使莫斯科承認美共領導人對美國的觀察是正確的，他們確實掌握了美國所有的具體特徵，然而莫斯科的政策仍不能建立在這種觀察之上，因為它們不過是普遍特徵的補充而已。換句話說，美國同志們窮盡所有的智慧也只能抓住美國的具體特徵，它們仍要服從於普遍特徵。那麼普遍特徵由誰來掌握呢？當然是莫斯科了。所以無論各國共產黨對本國的觀察是甚麼樣的，最終的裁判仍然是莫斯科。從這一角度來說，任何集團都可以被打成右派，只要莫斯科願意的話。現場沒有一個人對斯大林的辯證法提出異議，因為他們都接受了與斯大林一樣的思維方式，此種思維方式早已深植在他們的頭腦中，他們怎麼會反對呢？

在批評了美共的根本錯誤之後，斯大林開始就其具體行為進行批判。他說，首先，「他們在日常工作中，尤其是多數派領導，是受無原則的宗派主義驅使的，他們將宗派利益置於黨的

利益之上」。其次，「兩個集團，尤其是多數派，是如此深染宗派主義疾病以致於他們將其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建立在腐朽的外交政策上，一種外交陰謀政策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原則之上。」⁴⁰接下來斯大林便列舉了兩個集團的種種陰謀手段，如雙方在美共六大上比賽譴責布哈林；少數派聲稱自己是「斯大林派」；多數派對佩珀的態度之轉變⁴¹；雙方利用同斯大林的談話來謀取宗派利益等等。斯大林對此不無諷刺地說：「美國共產黨的兩個集團就像比賽中的馬，互相競爭，你追我趕，沉迷於猜測在蘇聯共產黨記憶體在的和不存在分歧。……他們這樣做是為了給他們自己的特殊宗派謀取一些利益，給其他宗派帶來損失。」⁴²從上面這些言論中可以看出，斯大林著重批判的是多數派。

同上述這些爾虞我詐，明爭暗鬥的齷齪行為相比，斯大林描述出了一個聖潔美好的共產國際：「同志們，共產國際不是證券市場，共產國際是工人階級的聖中之聖。因此，共產國際一定不要同證券市場混在一起。或者我們是列寧主義者，我們一個人同另一個的關係及分部同共產國際的關係都必須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必須是水晶般的清澈和純潔，反過來，共產國際同分部的關係也是如此——這樣，在我們的隊伍中就不會為腐朽的外交陰謀留有空間；或者我們不是列寧主義者——這樣，在我們的關係中就會充滿腐朽的外交伎倆和無原則的宗派鬥爭。這一個還是那一個，我們必須選擇，同志們。」⁴³在這裏，斯大林設定的是一個沒有選擇的選擇，他將列寧主義者和非列寧主義者同兩種截然不同的品質必然地聯繫在一起，列寧主義者們還能有其他選擇嗎？聯繫兩個集團的行為，作為一個列寧主義者做出如此齷齪的行為難道還不感到羞愧嗎？面對聖潔的殿堂難道還不該幡然悔過，痛改前非？斯大林將共產國際描述得愈聖潔，就愈加強了他打擊美共的力量。歷史上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一個組織或個體越自詡為高尚、純潔的化身，它（他）就越不寬容，它（他）的道德理想越高，對反抗它（他）的事物就打擊得越厲害。就如同一切的「人性善」理論一樣，片面高昂人性的一面而強行割除其認為不善的一面，這樣就導致了對人的完整性的否定，造就了片面、苛刻、教條的人。這樣形成的人際關係更多地是相互挑剔、指責和抱怨，人與人之間只看到錯誤和缺點，最終鬧得矛盾重重、仇恨滿天。

斯大林就是一個自認為完善的人，在他的道德力量與政治力量的夾攻之下，美共已成了驚弓之鳥，於是斯大林順理成章地拋出了他的最後裁決：

- 1、必須支持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主要行動和建議……
- 2、必須以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名義向美國共產黨黨員們發一封公開信，列舉黨的兩個派別的錯誤並特別強調清除所有的宗派主義問題。
- 3、多數派領導人在美共大會上的行為，尤其是在佩珀問題上的行為要受到譴責。
- 4、最後一定要提及美共目前的狀況，如積極工作問題，……在工會中的工作問題，與改革主義鬥爭的問題，與「右傾」鬥爭的問題……
- 5、美國共產黨執委會的書記處必須重組，要將那些能夠比宗派鬥爭看得更遠，能夠看到工人階級反抗資產階級，能夠將黨的整體利益置於個人集團及其領袖的利益之上的工人招進來。
- 6、洛夫斯頓同志和畢特曼同志必須被召來受共產國際的處理，以使美國成員最終懂得共產國際會嚴肅對待與宗派主義的鬥爭。

斯大林最後強調，必須以最嚴肅的態度對待這些建議，「因為這些建議的目的是要使美國共產黨成為一個健康的黨，使之能夠清除宗派主義，形成統一，加強黨的力量和使之布爾什維克化」⁴⁴。

不過，當我們通篇考察斯大林的這篇講話之後，我們不難發現，斯大林的真實目的是為了使美共和其他共產黨懂得：不要對抗莫斯科，否則你會得不償失。布爾什維克化就是向蘇聯共產黨看齊，向共產國際看齊，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然而洛夫斯頓等就是因為向蘇共看齊才落此下場的，為甚麼呢？因為他們看錯了人。這就讓莫斯科的追隨者們為難了，因為他們事先無法知道到底誰會勝出，所以很難下注，但不下注又不可能，所以只能賭了。這樣一來，斯大林責怪其屬下搞宗派鬥爭就沒有理由了。因為一切都是由他的黨引起的。也難怪洛夫斯頓心中意難平：成也是你莫斯科，敗也是你莫斯科，我們就只能任你擺佈嗎？所以他要反抗。

（七）暗渡陳倉

在美國委員會著手起草致美國共產黨的公開信時，洛夫斯頓等也在悄悄地調兵遣將。在臨行前，洛夫斯頓、吉特洛曾秘密叮囑留守的邁納和斯塔奇爾要守好陣地。此二人此時分別為美共的代理總書記和組織書記。同時洛夫斯頓等還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他們讓邁、斯二人列了一張可靠人員的名單，若共產國際作出不利於他們的決議時就將黨的所有財產轉入這些人之手，他們還同黨的律師談妥了出售黨的建築物的事宜。洛氏集團要以破釜沉舟的大拍賣來同共產國際講條件。⁴⁵

遠在莫斯科的洛夫斯頓、吉特洛還同美共保持著聯繫，以確保家中無事。邁、斯二人電告他們說沒有問題。這一樂觀情況使洛氏等堅定了同共產國際對抗的決心，5月9日，他們達成一個共識，即，如果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建議被接受了，美國共產黨將被迫得出結論：「共產國際執委會企圖摧毀（美國的）中央委員會並因此就遵循了這樣一種政策，即將先前的反對集團的宗派主義合法化並使它在今後延續下去。」⁴⁶這無異於是對共產國際的直接宣戰。

共產國際以為美共代表團已完全屈服了，就在斯大林的講話的基礎上起草了一份聲明，並將之發給美國代表團，讓他們表態。這份聲明就是後來眾所周知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致美國共產黨的呼籲書》（以下簡稱「呼籲書」）。這是一篇典型的意識形態八股文，它先是說美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錯誤估計了這些，錯誤估計了那些，脫離了甚麼，抹煞了甚麼，忽視了甚麼，滑到了甚麼的地步等等。一會兒是甚麼形「左」實右錯誤，一會兒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完全讓我們形成了這樣一個印象：只要不聽我共產國際的話，我就能給你戴上各式各樣的帽子。這之後才有了一種確切的定罪，「美國共產黨內的右傾錯誤思想表現在所謂的『例外論』上，其最狂熱的擁護者是倍倍爾（即佩珀——筆者）和洛夫斯頓。他們的觀點可以概括為：資本主義發生危機，但美國例外，群眾激化，但美國例外，必須開展反對改良主義的鬥爭，但美國共產黨內不必要這樣做。」⁴⁷這是共產國際首次提出「例外論」這一概念，「美國例外論」一詞在美共內從此盛行起來。

接下來自然是對「例外論」的狂轟濫炸，接著又描述了共產國際如何苦口婆心地勸導和挽救墮落的美國同志們，但他們仍執迷不悟，已經仁至義盡的共產國際實在不能容忍他們再糟蹋莫斯科的清譽了，無奈之下做出如下決定：

- 1、責成中央委員會的多數派和少數派立即解散派別組織，結束一切派別活動。責成美國共產黨的所有組織執行這一決定。對於搞派別活動的人可以採取最嚴厲的紀律措施直至開除出黨。
- 2、洛夫斯頓及畢特曼同志作為多數派和少數派的極端派別活動分子應該停職暫不參加美國共產黨的工作。
- 3、駁回中央委員會的少數派召開非常代表大會的要求。
- 4、認為必須改組和擴大中央委員會書記處，以保證書記處進行真正集體的非派別性的工作，並盡可能協助中央委員會制止黨內的派別鬥爭。
- 5、倍倍爾案件交由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審理。⁴⁸

這樣的決定如何也不能使人們想起共產國際與分部之間的平等的、兄弟般的關係，正如斯大林描述的那樣。對此共產國際又另有說法：「**只有在共產國際路線的基礎上團結全黨**，為完成黨的主要任務而進行反對右傾危險的更加有力的鬥爭，美國共產黨才有可能成為美國無產階級的真正布爾什維克的先鋒隊，才能成為美國工人階級群眾性的政黨，黨的隊伍中才會出現真正的黨內民主和所有黨組織及黨員都必須無條件遵守的無產階級鐵的紀律的二者同時發展的局面。在這樣的政黨內少數才會無條件地服從多數人**本著共產國際的路線和具體指示的精神**作出的決定。這樣的政黨一定能領導美國人民開展反對資本主義的勝利的鬥爭。」（著重號為筆者所加）⁴⁹很清楚了吧。要想成為兄弟，要想平等和民主的前提首先就是要聽共產國際的話。多數決定少數的原則的有效性前提也是：這個多數必須是聽共產國際的話的多數。只要聽話，你一切都是，無論是兄弟還是先鋒隊，否則你甚麼都不是。

面對這一毀滅式的最後通牒，洛夫斯頓等決定冒險一搏。《呼籲書》是5月11日送達給他們的，12日他們就擬好了一封給邁、斯二人的電報，並託一個為蘇聯情報部門工作的美國間諜將此電報帶回美國。電報的大致內容如下：共產國際的決議草案意味著對黨的摧毀，所以美共要建立起堅固的統一戰線，在美國代表團到達之前不要接受任何人的任何行動和建議，甚至是共產國際的指示。若代表團被阻撓回國，美共就要向莫斯科施加壓力要求代表團全部回國。同時務必要控制住黨的所有單位的所有財產和親信成員。⁵⁰

一場老鼠與大象的鬥爭就要開始了。

（八）斯大林的詛咒

在共產國際的美國委員會上，主僕雙方爭執不下。吉特洛以不卑不亢的態度回答了共產國際的最後通牒：我們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但這一次恕難從命，因為接受這一決議「將會使我們絕對無法繼續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有效地開展工作。」⁵¹

面對如此抗拒莫斯科權威的行動，斯大林覺得有必要再給美國同志們上一課了，以便讓他們搞清楚：到底誰是權威？該如何對待權威？甚麼是民主、甚麼是集中？在莫斯科的領導下，各國共產黨該是甚麼樣子？

在1929年5月14日的晚上，當著大約150名各黨領袖的面，斯大林開始教訓美國代表團，他說：「這一聲明（即吉特洛的講話——筆者）的根本特徵就是它表達了不服從共產國際執委

會主席團的決議的觀點。這意味著多數派領導人的極端主義已使他們走上了不服從的道路，因而也就是向共產國際宣戰。」為了讓美共代表團無路可退，斯大林又精闢地闡釋了民主集中制的含義：「不能否認，我們的美國同志們同所有的共產黨人一樣，都有權不贊同委員會的決議草案並有權反對它。只要他們把這種權利的實施限制在這個範圍內，是沒有錯的，也不會有任何錯誤。但問題是，5月14日的聲明並未停止在這裏，它走得更遠；它認為即使在草案成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議之後也必須要繼續鬥爭。因此，我們必須將問題公正地向美國代表團擺出來：當草案具有了共產國際決議的強制性力量時，他們認為他們本身有權利不服從這一決議嗎？……作為共產主義者、列寧主義者，美國代表團的成員認為他們自己有權不服從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美國問題的決議嗎？」⁵²這不是很明白嗎？美國同志們以及任何共產主義者的民主權利僅止於對上面的決議發發議論，寒暄幾句，當然也可以發發牢騷，可以有不滿，但這之後就是絕對地服從這一決議了。人們的民主權利要限制在對決議毫髮無損的範圍內，這當然「不會有任何錯誤」。決議仍然是決議，它絲毫不為人們的議論和不滿所影響。因此體現在此決議上的強制權力自然會消滅一切的異議而達到絕對的統一，從而體現出列寧主義原則的優越性。當美國代表團的同志們不滿足於僅發發議論和牢騷的民主權利而企圖要將自己的意見寫進決議，從而對決議產生積極的和實質性的影響時，這就超出了斯大林所理解的「列寧主義原則」所能允許的範圍了。這樣的同志就不能稱其為列寧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了。這種做法是墮落的資產階級才提倡的，這會破壞共產國際鐵的紀律和統一，同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及其優越性是不相符的。所以即使面對一個自己未參與制定的決議，美國代表團也只有服從的權利。

為了讓美國同志們更明白到底誰說了算，斯大林乾脆說：「聲明的作者們明顯忘記了共產國際大會的決議的解釋者只能是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而不是他們。如果聲明的作者們認為美國的工人們會相信他們的解釋而不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解釋，那他們就錯了。」夠坦白了吧，這無疑是在說，共產國際既是真理的創造者和擁有者，又是真理的闡釋者，它擁有絕對的權威，它的地位不可動搖。在這裏除了服從便是服從。因此，「美國代表團的宣言是反對共產國際路線的鬥爭綱領，它是在機會主義的搖擺不定、宗派主義的無原則狀態下和反對美國共產黨的統一的名義下寫出來的。」⁵³既然真理在共產國際手中，自然可以用各種名目來譴責不順從者。

有人也許會問，共產國際現在反對宗派鬥爭，但在以前布爾什維克不是經常在社會民主黨內搞宗派鬥爭嗎？斯大林也想到了這一問題，他的辯護是這樣的：「在那時宗派主義是有用的和重要的。但是現在呢？現在不同了。環境已有了根本上的轉變。現在我們擁有了自己的堅如磐石的共產黨，共產國際分部。現在宗派主義是危險的和有害的，因為它在勞工運動中削弱了共產主義，削弱了共產主義對改良主義的進攻，削弱了共產主義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⁵⁴可見布爾什維克是否需要宗派主義只是針對其對它自身是否有用來決定的，但這不是以「我」為中心的機會主義嗎？既然「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勇敢不包括將個人的意志放在集體的意志之上，放在共產國際的意志之上」，⁵⁵這一組織要求個人的絕對服從，而它本身卻為所欲為，超越一切個人和組織甚至是整個人類社會，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個人的「唯我」中心不合法，而組織的「唯我」主義就合法了？所以我們看到了這一組織內的各種悖論現象：屬下要絕對地服從上司，個人要無條件地服從組織，而上司或組織卻可任意改變原則；單個的個人總是死板、僵化、千人一面的，而整個組織的運動卻如火如荼，花樣百出；單個的個人像枚機械的螺絲釘沒有自由，而整個組織卻像一架高速運轉的機器，它在歷史的軌道上橫衝直撞，欲望上帝般的解放和自由。

斯大林不管這些，他知道他的同志們不會對他的辯護提出任何異議。於是他乘勝追擊，將洛夫斯頓等趕得無路可逃：

有幾句話是關於洛夫斯頓集團說話的自誇方式的，他們說他們在這裏是代表整個黨，代表美國共產黨的99%講話的……人們會認為他可以隨意支配99%的黨員。這是一種壞的方式，美國代表團的同志們。讓我來提醒你們一下，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有一次也打出了百分比的牌，並使每個人相信他們已保證了，或無論如何將保證在蘇聯共產黨中有99%的多數支持他們。同志們，你們知道，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是以甚麼樣的滑稽方式收場的。因此我建議你們不要打百分比的牌。你們聲稱你們在美國共產黨中有確定的多數，而且你們會在任何環境下保持那樣的多數，那是不對的，美國代表團的同志們，是絕對不對的。你們擁有多數是因為美國共產黨直到現在仍相信你們是共產國際的堅決支持者。只因為黨認為你們是共產國際的朋友你們才在美國共黨的隊伍中擁有多數的。但如果美國工人們知道你們企圖破壞共產國際隊伍的團結並想向它的行政機關宣戰，將會發生甚麼呢——這才是問題之所在，親愛的同志們？你們認為美國工人們會跟隨你們反對共產國際，他們會將你們宗派集團的利益置於共產國際的利益之上嗎？在共產國際歷史上已有大量的例子，當它的許多最受歡迎的、比你們更具權威的領導人一舉起反對共產國際的旗幟時，他們就會發現他們已是孤家寡人了。你們認為你們會比這些領袖們做得更好嗎？多麼可憐的希望，同志們！現在你們正擁有正式的多數。但如果你們試圖發動反對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議的鬥爭，明天你們就會失去多數並將發現自己完全被孤立了。你們一定會如此的，親愛的同志們。⁵⁶

這是斯大林消除反抗者的最為經典的論據闡述。他會一步一步地摧毀對手的力量和希望，最終剝奪其所有的自信和尊嚴，使之俯首稱臣。在精明老辣的斯大林面前，洛夫斯頓的各種手段都如同兒戲一樣被識破和摧毀了。

最後斯大林發出了他的詛咒：「如果美國代表團的同志們接受了我們的建議，一切都好；如果不接受，等待他們的是一切最壞的結果。共產國際將在任何條件下採取適當的行動。對此你們不必懷疑，親愛的同志們。」⁵⁷「美國共產黨不會滅亡。它會充滿活力並日漸繁榮，使工人階級的敵人感到沮喪。只有一小部分宗派集團會滅亡，如果它仍舊頑冥不化，不服共產國際的意志、繼續堅持它的錯誤的話。……如果這一小宗派團體不可避免地要消亡，就讓它消亡吧，只要共產黨會生長和長存。」⁵⁸

誰還敢反抗呢？美國歷史上最為壯觀的一次對抗共產國際的鬥爭就在斯大林的詛咒下，在他一口一句「親愛的同志們」的擁抱下土崩瓦解了。美國代表團中除洛夫斯頓、吉特洛、沃爾夫外全都向斯大林投降了。在場的150多名外國黨領導人沒有一人為美國代表團說話。洛夫斯頓終於明白，為甚麼佩珀和羅易勸他們不要去莫斯科。他們也終於懂得，斯大林崇尚的列寧主義的統一原則是甚麼，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又是甚麼，多數決定少數的原則本質是甚麼，甚麼是國際主義，甚麼又是鐵的紀律。

（九）全軍覆沒

斯大林的預言是正確的，美共果然不敢反抗共產國際。1929年5月15日邁、斯二人就收到了洛夫斯頓的秘密電報。他們討論了兩天，正在猶豫不決時，共產國際的《呼籲書》於5月18日到了。他們當即選擇了後者。正如投降斯大林的貝達特所說：「我們不僅將接受決議看作一件

紀律上的事情，還將接受決議的正確性作為承認共產國際高於我們自己的國際優越性和意識形態上的優越性。正式接受決議因此必須總是被轉變為政治上的接受。正式接受共產國際的決議必須完全伴隨著對我們所接受的決議的意識分析，以我們看透和吸收共產國際制定這一決議的政治原因。只有這樣才能維持共產國際的政治統一以及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國際上的一致。」（著重號為筆者所加）⁵⁹看來深受意識形態訓練的「列寧的學生們」真得沒有其他選擇，邁納率領的美共中央委員會當即做出決定，全力支持共產國際的呼籲。在其聲明中，本來一句話就足以表達其忠心了，但中央委員會將之表達了五次。⁶⁰

莫斯科卻早已在5月17日替美國共產黨解除了洛夫斯頓、吉特洛、沃爾夫的所有職務，就像處理自己黨內的成員一樣。這對於整日高唱民主、平等、兄弟的共產國際來說簡直是一個莫大的諷刺。不僅如此，上述三人還被扣留在莫斯科多日。吉、沃二人先被允許回國，但洛氏則仍被扣留，他被迫寫下了多次保證，保證不再反抗共產國際。最後他是在朋友的幫助下才於1929年6月1日逃出蘇聯返回美國的。這一逃跑行為又受到了莫斯科與美共的批判。6月27日，《工人日報》就登出了開除洛夫斯頓的消息。不久吉、沃二人也相繼被開除。牽連人數後來多達二百多人。他們成立了「美國共產黨（多數派）」來與莫斯科領導下的美國共產黨分庭抗禮。

至此，一場「美國例外論」引起的鬥爭不知是結束了還是剛剛開始。

三 餘 論

這場鬥爭讓我們不得不思考，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莫斯科的權威為何如此之大呢？為甚麼連生活在號稱自由民主之鄉的美國也會對之俯首稱臣呢？它如此的權威來自於哪裏呢？

事情仍要從黑格爾、馬克思和列寧說起。黑格爾的辯證法衝破了康得為理性作的限制，使辯證法成了一種具有本體論構造的客觀獨立主體：「辯證法是現實世界中一切運動、一切生命、一切事業的推動原則。……現在我們可以說，辯證法在同樣客觀的意義下，約略相當於普遍觀念，所謂上帝的力量。」⁶¹這就是說人們的意識、觀念與歷史事實之間的不可通約的界線已被打破了，人就能夠通過理性掌握一切事物的絕對知識，人的精神也就達到了完全的自由。這為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提供了保證，為觀念的物化創造了前提。辯證法成為實質理性的運動法則，是自由思想的平等邁向自由精神的專權的關鍵的一步。⁶²因為各種觀念或意識形態都不可能完全與歷史等同起來，沒有哪一種意識形態能夠說自己就是絕對正確的。然而一旦有人說辯證法能夠同歷史事實完全統一起來，一切事物都變成了辯證法而能被人的知性所把握，那麼各種觀念平等競爭的局面便不可能存在了。因為這時有了真理的標準，且真理是唯一的。一種觀念或學說自稱認識了歷史的、自然的普遍客觀規律或絕對的知識時，其他與之不同的觀念都將會被看作謊言或欺騙。

黑格爾的辯證法使自由思想的獨斷性大大增強了，用他自己的話說，它幾乎擁有了「上帝般的力量」。當馬克思將黑格爾的辯證法顛倒過來，使邏輯與歷史完全統一時，辯證法的力量就更不可阻擋了。「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顛倒，在歷史社會學的用法上推進了實質理性的辯證法，使之成為歷史社會的運動法則，成為自由的現實批判的革命精神，使費希特和黑格爾已具有革命性的啟蒙精神成為現實政治的革命行動，成為社會政治現實生活中的啟蒙式革命行動：由於無產階級是歷史的辯證運動中的先進階級，其階級身位就具有革命辯證法的

批判使命，或者說就是自由精神本身。」⁶³簡而言之，就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使真理與具體的歷史成分統一起來，即真理就是某個階級、某個事物或某個人本身。這就為這些人或物的獨斷權力提供了依據。

將黑格爾的思辯的歷史總體變成具體的政治的階級意識，並且將馬克思的倒置的辯證法進一步實現的便是列寧了。「只有通過列寧的階級意識，這種總體才成為實踐的自覺的有力工具，因而成為鮮明的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由階級意識概念的這種政治化，開始了那個作為主客體同一的無產階級的明顯的物化，無產階級第一次創造了把意識形態擴張到社會政治領域中的客觀可能性。馬克思與列寧實現了黑格爾想過的東西。然而意識形態就其根本結構來說並無原則改變。對總體的意向想把自己在社會歷史方面加以具體化的意向，關於鬥爭、利益、揭露和蒙蔽的思想，相對地說，在馬克思那裏僅僅比在黑格爾那裏理解得更具體，在列寧那裏，才最後真正成為以政治鬥爭的殘酷性變成了的現實。」⁶⁴也就是說，黑格爾那神秘主義的思辯神學的辯證法預設了一個充滿辯證法的世界，然後他又自負地宣稱人類能夠把握這種辯證法，為人們將思辯與歷史這兩種不同質的東西同質化創造了條件；馬克思則將這種辯證法顛倒為世俗化的具有神聖革命使命的辯證法，人不僅能夠把握歷史邏輯，還要用這種歷史邏輯去安排歷史；列寧則將這種辯證法付諸實踐。

這種辯證法具有三個典型的特徵：一是它要揭露虛假意識（或反動意識）；二是它自身則體現為歷史的自由意識；三是它是正當且神聖的革命性行動。⁶⁵具有獨斷權力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便由此而生。因為在這種辯證法下，思維不僅能夠把握現實，還能成為現實，反之亦然。真理與現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統一。而無產階級就是真理的最終壟斷者。讀過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的都不難覺出列寧那充滿道德優越感的獨斷話語中所包含的另一層意思：我們就是真理，反對我們的都是反動派，其他觀點都是哲學唯心主義的謊言和糊塗觀點，是「糊塗蟲的無聊的胡言亂語」，⁶⁶是信仰主義，是黑幫思想。⁶⁷

在書中列寧嘲諷馬赫的名言——「沒有物理的必然性，只有邏輯的必然性」⁶⁸——是反動透頂的學說，指責接受馬赫學說的俄國知識份子喪失了黨性原則的人。馬赫的學說在於要阻止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僭越行為，阻止其從邏輯領域向現實領域的非法過渡。因為人的任何知識都是或然性知識，必然性知識——自在之物是人所不能達到的。任何知識都滲入了人的主觀性，不可能達到徹底的客觀。即使是自然科學中的定律也不敢說它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關於經驗的精確科學所提出的所有規律雖然是真正的規律，但從認識論上看，它們只是一些觀念化的臆想」，這些規律也仍然是或然性的知識，且「實際上只能被看作是一種觀念的可能性，它們並不排斥無限多的其他可能性。」所以「真正的規律性在事實認識的領域中只是一種理想而已。」⁶⁹自然領域內的知識尚且如此，更何況那紛繁複雜、飄忽難測的社會、歷史領域。

但是深深陷入黑格爾、馬克思的辯證法之中的列寧全然不顧上述限制，他嘲笑這些審慎的哲學思考說：「『超越』的思想，即現象和自在之物之間有原則的界限的思想，乃是不可知論者（包括休漠主義者和康得主義者）和唯心主義者的荒唐思想。」⁷⁰在列寧看來，在人的理性面前，不存在甚麼界限，也不存在它不能認知的東西，人能夠達到上帝般的萬能和自由，「從人能夠用這些元素製造出東西來供自己使用的那個時候起，正如恩格斯所說的，人就可以認為他認識了自在之物。如果基督教的上帝真的存在而且真的創造了世界，他所作的也不會多於這些。」⁷¹

當然，在列寧冷靜一些的時候也曾懷疑過人能成為上帝，也曾承認過人的有限性，他說：

「恩格斯關於物的客觀性質的可知性和關於『自在之物』轉化為『為我之物』的論點，同他關於盲目的、尚未被認識的必然性的論點是完全一致的，……從認識論上說，這兩種轉化完全沒有甚麼差別，因為它們的基本觀點是一個，都是唯物主義觀點，都承認外部世界的客觀性和外部自然界的規律，並且認為人完全可以認識這個世界和這些規律，但是永遠不能夠徹底地認識它們。」⁷²但我們不難看出其間的矛盾，雖然列寧不大情願地承認人不能徹底地認識必然性，但其所接受的辯證法及其自身的情緒使他成為上帝的願望非常強烈，最終他所擁抱的是那個將「自在之物」轉化為「為我之物」的人神——一種極端自我中心的東西。在他為車爾尼雪夫斯基辯護的話語中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告訴那些思想混亂已極的俄國馬赫主義者：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看來，就象在一切唯物主義者看來一樣，物件——用康得的過分矯飾的話來說就是『自在之物』——是真實存在的，是我們完全可以認識的；不論是它們的存在，或是它們的質，或是它們之間的真實的關係，都是可以認識的。」列寧又回到了黑格爾，「告訴糊塗蟲馬赫主義者：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看來，就象一切唯物主義者看來一樣，在現實中，有著我們以為是因果聯繫的東西，有著自然的客觀的因果性或必然性。」⁷³在這裏，人的有限性已先具有了無限性，即是潛在的上帝。

列寧動輒以「我們唯物主義者」如何如何，嘲諷其他哲學都是信仰主義，然而他卻從未覺察到他所繼承的黑格爾、馬克思的辯證法本身就是以神秘主義的信仰為前提的。因為認為一切事物皆含有辯證法和理智直觀能把握終極實在的觀點是靠信仰而非實證支撐的。就連黑格爾本人也承認他的理性真理是「內在論的神秘主義」。列寧卻敢於宣稱他的知識是客觀的、必然的，這種僭越使他獲取了非法的自由獨斷權力。

在接受了列寧的學說的人的眼中，無產階級是歷史必然的化身，它擁有必然的知識，是真理的壟斷者，所以它的權力如同上帝一樣自由而絕對。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大本營的共產國際自然繼承了這一權力，因此，當其他黨派抱怨共產國際獨斷而粗暴時，季諾維也夫會不慌不忙地說：「有人企圖證明，我們施加了可怕的壓力，規定了很厲害的集中制。恰恰相反，我們的組織正是缺乏應有的聯合統一。我們很了解，許多重要問題按其實質說應該由本黨在本國範圍內解決。我們也許過於輕易地企圖在國際範圍內解決那些實際上只能在一國範圍內解決的問題。然而也有一些問題必須用國際觀點去解決，我們應該有一個比過去更為集中的組織，更好地進行組織聯繫。由於糊塗，有人大喊莫斯科專政。實際上，不夠集中和缺乏足夠的團結，這是可以向我們提出的唯一的指責。（喊聲：『對』）……我們的任務在於創建一個統一的國際黨。」「同志們，請宣佈你們的評判，而我們的錯誤我們自己是知道的。」⁷⁴人們還能說甚麼呢？共產國際與莫斯科有權專斷，因為它們就是真理，人們能要求的只能是給予莫斯科以更集中的權力。別人的判斷也不能影響莫斯科的判斷，因為真理在握的莫斯科是全知全能的，它的錯誤也只有它自己能夠發現，改正與否也全在於它的意願。共產國際不需要外來的批評，因為它有體現其全能的自我批評。一個全能的機構還有何不可為呢？「……明年我們將有一個完全符合『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稱號的執行委員會。……當它成為這個樣子的時候……執行委員會才確實是兩次代表大會之間的最高權力機關，它的话才能成為法律。那時將不再有甚麼『不可侵犯』的黨、『不可侵犯』的綱領了，而存在的是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鋼鐵般的統一的國際組織。（暴風雨般地長時間的鼓掌）」⁷⁵此時的共產國際仍羽翼未豐，但它卻想將它的權力拔高到這樣一個位置，即它不需要任何的束縛，而它卻可以摧毀一切阻擋它的組織和法規。它是絕對自由的，也是絕對專制的。它是將邏輯與歷史結合起來的辯證思維衍生出來的一個怪物。各國共產黨還敢反抗嗎？

而且誰又願意反抗呢？既然大家都遵循著同一種邏輯，他們又怎會自己反對自己呢？那鏗鏘有力地喊「對」聲和暴風雨般的掌聲並不全是諂媚逢迎，而是很大程度上發自內心的狂喜和激動。試想誰不想擁有那神一般自由而絕對的權力呢？誰也不會質疑季諾維也夫那獨斷的話語：「共產國際是一個實幹的國際，是一個行動的國際，是一個國際共產主義的世界黨以及其他等等，這在原則上是絕對正確的，我們必須堅持這一點。」⁷⁶

這樣的權力機制會產生甚麼樣的影響呢？一個不受束縛的擁有無限權力的機構既可以產生巨大的建設作用，也可以產生巨大的破壞作用。如果領導人有足夠的理智並能做出比較符合實際的決策時，它便會產生積極作用，反之則會是巨大的破壞和浪費。而人的品性是飄忽不定的，他做出正確判斷同做出錯誤判斷的機率是相等的，他向善的渴望與向惡的欲望也是等同的，所以將具有無限權力的機構交於脆弱的人的手中，將全部賭注壓在人的本性之上是有很大的風險的。人的脆弱本性使之常會打著無私的旗幟做自私之事，以道德的名義行不道德之舉，用公正廉潔的幌子掩蓋貪污腐敗之惡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這類現象是很常見的。這種權力機制只能培養起脆弱的清官意識，然而清官恰恰是最不可靠的，因為人性善的信仰根基太脆弱了。巨大的權力更易滋養人的惰性，教條主義、官僚主義都是權力的衍生物。它們會漸漸消磨人的理智判斷力和道德敏感性，最終混淆真理與謬誤的界限。

這樣的權力機制下產生的更為嚴重、更為久遠的影響是對人性的扭曲。絕對的權力會造成主奴品性的悖論統一。一個處於權力鏈條中的人，對上級來說是個忠順的奴僕，他要絕對服從上級，上級便是真理的化身，他的一切全掌握在上級手中。而對於他的下級來說，他又是真理的化身，他又擁有處置下級的絕對權力。所以主人與奴僕、暴虐與馴順、狼與羊的品質在一個人身上奇妙地組合起來了。

在擁有絕對權力的體制中，人可以成為神，呼風喚雨，彈指間億萬人頭落地；也可以成為刀俎之肉，任人踐踏宰割。他卻從不能成為具有獨立人格的人。絕對的權力下塑造出的大多是神或野獸，很難出現真正的人。斯大林在列寧的遺囑下馴服如羊，不敢有絲毫怠慢，而一旦這一威脅消除，他便無法無天起來，成千上萬的宰殺異己。蘇聯人在斯大林在世時無不膽戰心驚，日日生活在恐懼中，而在其死後卻兇狠地將其棺墓掘出，進行唾罵與鞭撻。這主奴辯證法至今仍在迴圈不已。

列寧不是建立了民主集中制，從而消除了一切體制弊端嗎？但他的「集中」遠遠超過了「民主」。美共前領導人吉爾·格林在回憶其61年的黨員生涯時說：「民主集中制原則意味著，它強調的是集中制，是領導的全權控制。」⁷⁷當人們為絕對權力歡欣鼓舞時（人們很容易受這種誘惑），絲毫未查覺到它對他們靈魂的腐蝕。毫無阻擋地熱情既可以創造一切，也可以吞壓一切。當人們責備斯大林時，都忽視了體制性因素在斯大林的罪惡中的作用，就連為斯大林時代塗脂抹粉、為人民那狂熱的造神運動激動不已的安娜·路易士·斯特朗也覺察到了這一點，「我那時這樣想，倘若一種制度是這樣組織的，在上面的人手中掌握著生殺大權，而手下一個壞蛋就能夠使他不了解人民的疾苦和要求，那就一定有甚麼東西非常錯誤。」這個激進的美國共產黨人失望地說：「這再也激不起我在莫斯科生活的意向了。」⁷⁸絕對的權力造就了權力崇拜，人人只為權力負責，人人都成了權力的附庸，甚麼獨立思考、實事求是都無從談起了，在集體的麻木不仁和不負責任中，生命的權利和尊嚴就會消失殆盡，剩下的只有相互的踐踏與迫害。

就連著名的左派思想家亞歷山大·科熱夫也說：「斯大林……要把他的臣民揉成麵團，然後

捏成他所需要的形狀，……違法或守法都被懲處，沒有甚麼東西能挽救你。」在淹沒了人的尊嚴的權力面前，無論反抗斯大林的洛夫斯頓，還是順從他的白勞德，都被斯大林那不可捉摸的法律所懲處了。

洛夫斯頓等對莫斯科的反抗，也如安伯托·埃珂所塑造的佐治修士對反抗教會的異端的描述：「我要說他們的存在對我們而言是珍貴的，那銘刻在上帝的計畫中，因為他們的罪促進了我們的道德，他們的詛咒鼓舞了我們讚頌的曲調，他們毫無紀律的懺悔使我們的犧牲有了規則，他們的不虔誠使我們的虔誠閃耀。正如黑暗的王子是必要的，有了他的叛變，上帝的榮耀才更眩目，才有希望的開始及結束。」⁸⁰所以作為異端的洛夫斯頓不僅不會對上帝般的莫斯科構成威脅，他們甚至還是增進莫斯科的榮耀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事實上布爾什維克化的進程在此之後推進地更加徹底，也更神聖不可侵犯了。在美共、蘇共和共產國際的歷史中，這類現象頻頻出現。

了解了莫斯科權力機制的來源和本質，我們理解起共產國際與美共的活動及其關係來就容易多了。

註釋

- 1 (日)上島武：〈新經濟政策後斯的情況與「右傾」反對派〉，蘇紹智等編：《布哈林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1983，第177頁。
- 2 蘇紹智等編：《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78頁。
- 3 蘇紹智等編：《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81頁。
- 4 蘇紹智等編：《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85、186頁。
- 5 蘇紹智等編：《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85-187頁。
- 6 蘇紹智等編：《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88頁。
- 7 蘇紹智等編：《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89頁。
- 8 轉引自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趙洵、林英譯，人民出版社，1981，上冊，第119、120頁。
- 9 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第115頁。
- 10 蘇紹智等編：《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97頁。
- 11 可參見要求剝削農民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對史達林的頌揚，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第110頁。
- 12 德格拉斯：《共產國際文件（1919-1943）》（Degrass, Jane.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Document*），London, 1971，第二卷，第418頁。
- 13 德格拉斯：《共產國際文件（1919-1943）》，第二卷，第426-433頁。
- 14 〈布哈林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關於執行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史料選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五卷，第283、284、285頁。
- 15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史料選編》，第五卷，第292-323頁。
- 16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Draper, Theodore. *American Communism and Soviet Russian*），New York, 1960，第285頁。

- 17 約伯爾編：《美國共產黨文獻史》，(Johnp11, Bernard K.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necticut·London, 1994, 第一卷, 第521-524頁。
- 18 豪沃、考澤爾：《美國共產黨，批判的歷史(1919-1957)》(Howe, Irvig and Coser, Lewis.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A Critical History 1919-1957*), Boston, 1957, 第165頁。
- 19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285-287頁。
- 20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288頁。
- 21 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第114頁。
- 22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和蘇俄》，第307頁。
- 23 蕭慶平：〈共產國際反對美共洛夫斯頓派所謂「美國例外論」的鬥爭〉，《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17輯，第100頁。
- 24 《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17輯，第101頁。
- 25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313頁。
- 26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313頁。
- 27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311, 312頁。
- 28 即當布哈林在大廳內作報告時，許多蘇共的青年黨員在羅明那茲等人領導下在走廊裏嬉笑閒聊，還時不時地嘲諷布哈林，聲稱布哈林的報告出自他們之手，他們已無須再聽。他們自稱是史達林主義者，言語中對布哈林已無任何尊重之意。(見伯特萊姆·沃爾夫：〈早期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和美國共產黨〉)(Bertram Wolfe, *Comintern-The Early Years; The Sixth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arty*), 《冬季瞭望》(Survey winter), 1979年第24卷, 第1期, 第168頁。
- 29 轉引自《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17輯，第101、102頁。
- 30 轉引自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377頁。
- 31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382、383頁。
- 32 豪沃、考澤爾：《美國共產黨，批判的歷史(1919-1957)》，第168頁。
- 33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391頁。
- 34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393頁。
- 35 珍妮·德格拉斯選編：《共產國際文件(1929-1943)》，東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5頁。
- 36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398頁。
- 37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401頁。
- 38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403、404頁。
- 39 〈史達林關於美國共產黨的講話〉(*Stalin's speeches on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見約伯爾編：《美國共產黨文獻史》，第二卷，第116頁。
- 40 約伯爾編：《美國共產黨文獻史》，第二卷，第117頁。
- 41 多數派為討好莫斯科，在美共六大上由保護佩珀轉而激烈地批判他，就像他們對待布哈林一樣。
- 42 約伯爾編：《美國共產黨文獻史》，第二卷，第117頁。
- 43 約伯爾編：《美國共產黨文獻史》，第二卷，第120頁。
- 44 約伯爾編：《美國共產黨文獻史》，第二卷，第123-125頁。

- 45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405、406頁。
- 46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413頁。
- 47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史料選編》，第五卷，第33、34頁。
- 48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史料選編》，第五卷，第35頁。
- 49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史料選編》，第五卷，第35、36頁。
- 50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416、417頁。
- 51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418頁。
- 52 約伯爾編：《美國共產黨文獻史》，第二卷，第127頁。
- 53 約伯爾編：《美國共產黨文獻史》，第二卷，第131頁。
- 54 約伯爾編：《美國共產黨文獻史》，第二卷，第132頁。
- 55 約伯爾編：《美國共產黨文獻史》，第二卷，第141頁。
- 56 約伯爾編：《美國共產黨文獻史》，第二卷，第135、136頁。
- 57 約伯爾編：《美國共產黨文獻史》，第二卷，第137頁。
- 58 約伯爾編：《美國共產黨文獻史》，第二卷，第144頁。
- 59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421頁。
- 60 見《美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回應共產國際的呼籲作出的決定》，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史料選編》，第五卷，第36頁。
- 61 黑格爾：《小邏輯》，第177-179頁，轉引自（英）吉爾比：《經院辯證法》，王路譯，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中譯本導言。
- 62 劉小楓：〈辯證法與平等的思想自由習性〉，見（英）吉爾比：《經院辯證法》，中譯本導言，第35頁。
- 63 吉爾比：《經院辯證法》，中譯本導言，第37頁。
- 64 轉引自吉爾比：《經院辯證法》，中譯本導言，第40頁。
- 65 吉爾比：《經院辯證法》，中譯本導言，第37、38頁。
- 66 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頁。
- 67 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第345頁。
- 68 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第296頁。
- 69 艾德蒙德·胡塞爾：《邏輯研究》，倪梁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卷，第62、63頁。
- 70 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第106頁。
- 71 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第199頁。
- 72 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第183、184頁。
- 73 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第362、363頁。
- 74 1921年6月13日季諾維也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上的講話，見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史料選編》，第五卷，第176頁。
- 75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史料選編》，第五卷，第177頁。
- 76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史料選編》，第五卷，第182頁。

- 77 安德斯·斯蒂芬森：〈與吉爾·格林的談話〉（Anders Stephenson, *Interview With Gil Green*），見馬歇爾·布朗等編：《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和文化新研究》（Michael E. Brown, eds., *New studies in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U.S Communism*），紐約1993年版，第320頁。
- 78 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回憶錄》，陳裕年譯，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147頁。
- 79 拉明·賈汗貝格魯：《伯林訪談錄》，楊禎欽譯，譯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1頁。
- 80 安伯·埃珂：《玫瑰的名字》，謝瑤玲譯，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459頁。

賈慶軍 寧波大學文學院講師，史學博士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二期 2006年7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二期（2006年7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